

廣東文史資料

6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六十七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B14/31

广东文史资料

第六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168,000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60册

ISBN7-218-00692-2/K·153

定价2.90元

目 录

革命哲学家的一生——陈唯实传略	杨友吾 (1)
杰出的统一战线工作者——胡一声	杨环宗 (25)
吴奇伟将军传略	王付昌 (32)
李汉冲生平事略	李洁之 张大华 (54)
李煦寰先生传略	李慕程 (71)
良医、良师、血液学专家郁知非	刘新彝 (86)
广东体育事业的开拓者郭刁萍教授	郭伟波 (96)
何启生平事迹纪略	杜国彪 (105)
拳拳赤子心 终生报国情——忆父亲廖舟行	廖鸣蝉 廖鸣芳 (136)
“鳄鱼大王”杨海泉先生事迹	杨预增 马光祖 (142)
著名印尼华人民族主义者郭克明	杨启光 (148)

聚居在潮州凤凰山脉的畚族	张开秀 (171)
乳源瑶族海外华侨、华裔概况	陈 晨 (182)
广州东山浸信教会四十年	黄增章 (188)
怀圣寺今昔	杨栋材 (197)
陈公博盛衰录	曾德明 (202)

革命哲学家的一生——陈唯实传略

杨友吾

苦学成名

陈唯实，原名陈英光，又名悲吾、励吾。1913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秋水区官塘乡潮阳社的一户三代贫农的家庭。由于常年欠租欠债，全家生活十分贫苦。父亲被同族恶霸地主陈天锦欺压凌辱，一气成病，吐血身亡。母亲由于生活无着，相继卖去唯实的一弟一妹，另一小妹刚生下来，由于实在无法养活，忍痛溺毙。仅有一弟随母飘流异乡，乞讨为生，直到全国解放，才过上幸福生活。

唯实五、六岁时即参加农田及家务劳动。以家境来说，本无上学读书可能，但由于同族子弟上学均可由祠堂公田收租所得给予补贴，得于1921年八周岁时入本村小学读书，早晚仍参加劳动。唯实入小学后勤学苦读，成绩总在前一二名。初小毕业后升入区立第一高级小学校，1927年高小毕业。尽管当时家境更为困难，但经师友苦劝，父亲终于同意他利用祠堂补贴继续考入潮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年后，由于父亲脚伤甚重，不能劳

动，家中生活实在难于维持，不得不辍学离乡去泰国做工谋生，时年仅15岁。在泰国1年，他实在忍受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便又带着省吃俭用剩下的一点点钱回国，再进韩山师范学校读书。乡师是二年制，复学1年后毕业。

1931年，唯实被分派到澄海县河东小学（即达濠小学）当高年级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由于他在国内外目睹和身受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压迫欺凌，爱国之心日趋强烈。据前华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小时在河东小学曾是唯实那个班的学生汪涛同志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早晨，陈老师独自集合起全班同学，拿出一叠黑纱，让每个学生臂上都带上一幅，大家怀着满腔悲愤，排成两路纵队，陈老师一人走在前面，紧握双拳，带头振臂高呼抗日救亡口号，呼吁抵制日货。事后，陈老师又结合当时形势，采用岳武穆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为临时教材进行讲课。这些，在学生们年少稚朴的心灵上，深深地打上了爱国主义的烙印。（见《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校庆特刊》）

1934年，唯实的父亲被恶霸地主欺压惨死，且不许停殓祠堂，草草埋葬后，唯实一气之下，带着对地主阶级的强烈仇恨和一连串自己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由同族几个长辈垫出路费，离开家乡，经上海转赴北平。到北平后住进可以不缴房租的潮州同乡会馆，省吃俭用，发奋读书。他也曾利用一张高中毕业的假文凭，进私立朝阳大学二年级当插班生，不久，假文凭被识破，不得不退学。此后，他便每天带点大饼油条到北平图书馆苦读。开始时他想研究文学，希望借写文章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后来渐渐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以极大的学习热情遍读20年代以来国内进步思想界翻译的哲学书籍，包括李达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艾思奇译的《新哲学大纲》，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等等，也读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其他一些人的哲学译著。在钻研这些译著过程中，他深深爱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萌发了一种志愿：鉴于当时的哲学书多是翻译本，内容一般也较难懂，十分需要以通俗易懂的哲学书去唤起劳动人民的觉醒，乃决心在哲学通俗化方面下功夫。他在北平图书馆刻苦攻读，收集了大量哲学资料，写了大量札记，对中、外哲学史与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理论准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崭新的学科也就渐渐有了根底。在北平时，他还有幸得到李达先生的指导与黄松龄先生的鼓励，学业日见增进。

1935年底，唯实转赴进步作家云集的上海，很快就结识了暨南大学具有左倾思想的教授张栗原先生，便在暨大附近找了一间旧房住下，就近到暨大图书馆借读，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海，又受到正在办《读书生活》杂志的艾思奇同志的影响和帮助，积极参加了艾思奇等同志发起的新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并与陈家康、张执一 etc 同志一起组织马列主义研究团体，还加入了上海著作人协会，并热心参加上海社联的活动和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这期间，他也有时到真光中学兼点语文课。这样，他一面钻研，一面开始写书，仅用了1年多点的时间，就写出了他头两部哲学著作，即各为十余万字的《通俗辩证法讲话》与《通俗唯物论讲话》，分别由上海新东方出版社和大众文化出版社于1936年出版（《通俗唯物论讲话》一书，由于对付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查禁”，1937年3月改名为《新哲学世界观》由上海作家出版社出版，后来又改名为《战斗唯物论讲话》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1937年4月，他又写成了20余万字的《新哲学体系讲话》一书，由上海作家书店出版。1936年与1937年出版的上述著作，就唯实的原来想法，都意在启蒙，主要是在青年中介绍当代新的哲学思想。在他

的几本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与辩证法最基本的内容，一般地都谈到了。对于马、恩、列的主要著作，从《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到《帝国主义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都有所谈及。对于国内外古、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也作了若干介绍。他的书中突出地宣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观点与革命思想，特别推崇他们的革命实践，突出哲学的阶级性与战斗性。他尤其着力于哲学的通俗化，力求做到文字的口语化、大众化和内容的明白具体，而不热衷于写深奥的大部头著作。他认为，“新哲学是最具体、最实用、最客观的真理，是最重要的学问，是大众所需要的世界观”，因而主张“要尽可能的实行哲学到大众中去”（《新哲学世界观》再版赘言），“要把新哲学内容尽量的具体化，并且要把讲话或文字的形式通俗化，使一般人都能听懂、看懂，理解它，接受它，这才不失为大众哲学的真正意义”（《新哲学体系讲话》序言）。他并尝试着把哲学道理同社会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即“一方面说明新哲学的原理，但是偏重应用方面”（《新哲学体系讲话》序言），“把新哲学文化和实际生活打成一片”，以“具体化、战斗化、实践化”作为写书的宗旨（《战斗唯物论讲话》再版序）。而这些良好意愿的贯彻，也就使他的哲学著作大为生色，别具风格。正因为如此，他的书出版后，很快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热爱。他的这几部书，都是一版再版的畅销书。有的3年中就再版5次（《战斗唯物论讲话》），有的在两个月内就再版了3次（《新哲学世界观》），而《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连印4版还不敷销售。不少青年，就是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等著作后，投身抗战和进入革命阵营的。此后，在青年中就流传着“南陈北艾”的说法。意思是说，当时搞通俗哲学出了名的，南方有个陈

唯实，北方有个艾思奇。这样的流传一直到全国解放初期在粤东一些中学还有人提及（参见1985年2月26日《汕头日报》陈衍俊的文章）。另一方面由于他的书直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把矛头指向旧社会，如说“现社会是腐败恶劣到极端了，无论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是反动极了，大众的生活是万分痛苦的，不能再忍受了。”（《新哲学体系讲话》205页）以及指名批判了当时的反动文人政客胡适、丁文江等人，尖锐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则备加推崇，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特别是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苏联新社会的面貌，并极力鼓励进取，倡导改革，这就触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他们下令查禁陈唯实的著作，把他的书定为“禁书”，不准出版销售。当然，这种反动愚蠢的行动，不仅没有“禁”住，却大大帮了作者和书店的忙，青年们反而争先恐后地购买，使唯实的几本著作一版再版，很快就销售一空。据唯实本人回忆，《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在上海遭禁后，又有人在北平暗地翻印，继续在市面上流传。这样，唯实就以他的几部哲学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与通俗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京沪沦陷，大批进步作家便以武汉为基地，参加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唯实于1937年到武汉后，继续从事哲学写作。他的哲学著作，也从一般联系社会生活，进而同配合抗战的要求与指导青年追求进步结合起来，明确地提出哲学理论要为抗日战争服务，青年们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与革命的人生观。在这一两年中，他写了《新人生观与新启蒙运动》（1939年8月山西民族革命出版社出版）与《民族革命哲学》（1939年上海辰光书店出版）。（据唯实本人记忆，还有一本《革命哲学》，是他在山西民族革命

大学讲课时，被一位助教王子野速记下来，他到延安后，对速记稿进行了整理修改，由艾思奇同志写了书评，交重庆《读书生活》杂志社出版）尽管唯实的上述8本哲学专著，对于30年代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他在晚年给女儿的信中，却十分谦逊地把自己30年代出版的几本哲学著作看作是“自觉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虽说其中也反映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但书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缺点”，则反映了自己“对于哲学研究的时代局限性”。他不仅没有由于两三年内写出了几本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社会意义的哲学书而感到满足，相反地却时时警惕到自己书中的种种局限性和不足，所以每当写书的序言时，总是诚恳地请求读者在读他的书时，同时要参看别位作者的著作和译本。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谦逊虚心的人品，也反映了他准备继续钻研的决心。唯实从1934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到1936年在上海开始出版自己的哲学专著，为时不过两年，竟获得如此明显的成就，这应该说是十分难得和可贵的。这其中体现着多么坚强的意志，又是浸透着多少辛劳的汗水啊！

抗战军兴，山西省老军阀阎锡山，在我党领导干部薄一波等同志的推动和帮助下，办起了旨在吸收社会青年接受抗战训练的民族革命大学，广泛邀请社会知名进步学者江隆基、徐懋庸、杜任之等到民大教书。通过他们的教学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青年中的影响，培养了大批有为的抗战干部。1938年，唯实应邀到民大担任教授兼政治系副主任，主讲民族革命哲学课。他在讲课中把哲学原理同抗战实际结合起来，批判亡国哲学，宣传革命哲学，深受进步青年的欢迎。

唯实以一个贫苦的简师学生和乡村小学教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全靠一股奋发图强、求知上进的热情，在中国共产党号

召全民抗战及其正确政策的影响和党内外进步学者的帮助下，苦学成名，走上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路，并专心一致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此也就决定了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工作和哲学通俗化工作的一生，并成为广大知识青年所熟悉和敬仰的知名学者。他在上海出书时，还只有23岁。恐怕当时读了他的哲学书、并称他为青年哲学家的读者们，未必会料到这位已是知名学者的年青人，竟年轻到只有23岁吧。

投身革命

1938年11月，唯实同志在山西获得朱德总司令面准，并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与教务长江隆基的邀请，随同党在山西工作的同志一起到达延安，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杨尚昆同志当时也在山西，曾留唯实继续在民大教书，后也同意唯实去延安）。唯实到延安后，深受党中央器重，请他担任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和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在陕公、抗大和八路军军政学院讲哲学课，还兼任中央军委高级干部哲学学习指导员。从此，他更加刻苦钻研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在此期间，他还认真研究了斯大林的哲学论著。并以“对斯大林唯物辩证法的介述”为题，在1940年6月21日延安举行的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作了发言（据1940年6月28日延安《新华日报》关于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的报道，唯实同志发言的题目是“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这次年会并作了指示。参加年会的有何思敬（主持会议）、艾思奇（报告会务）、范文澜、茅盾、周扬、张仲实、杨松、肖向荣、郭化若、冯文彬、和培元等五十多位同志。毛泽东同志还邀请艾

思奇、陈唯实同志到自己的住处吃饭，鼓励他们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称赞了他们在哲学研究和宣传方面做出的成绩。之后，唯实同志在上课时多次讲述了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写成《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一书，于1950年由南方大学教务处印发全校师生。

1940年，唯实同志在延安写了一篇“阎锡山哲学思想批判”的文章，深入剖析和尖锐批判了阎锡山所谓“中”的哲学，指出其唯心主义理论实质和反共产党反马列主义的反动政治实质。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篇有较大影响的文章。

抗战期间的延安，军民生活十分艰苦。唯实同志以其贫苦出身的素质，再加上经受了革命阵营的锻炼，在生活上颇能严于律己。他同别的干部战士一样，住窑洞，吃小米，穿粗布军服，参加开荒种地，积肥纺棉，使人很难看出他的知名人士身份。正是在延安这座革命大熔炉里，他逐步成长为革命知识分子。1941年2月，唯实同志在抗大经支书李克明、组织委员胡绍祖二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在延安7年，这是我一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我在这个时期脱胎换骨，由一个有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具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开始后，唯实同志于1943年在中央党校第三部（学员大多数是在文化战线上工作的党员）被指定为支部书记，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参加本部的整风审干工作。在整风过程中，他反复精读了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阅读时加圈加点，眉批旁注，密密麻麻地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在深入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认真对照检查自己，揭露自己思想上的缺点弱点。在他去世前给女儿的信中回忆说：“在延安时对我教育最大的

是整风运动。”在那之前，“我自以为是马列主义者，骄傲自大，不能一分为二的看待自己，不认识自己有什么缺点错误，因此，也不懂得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经过整风运动，通过学习，在组织和同志们帮助下，“我才认识自己有过个人英雄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在整风中，“我特别检查和批判了教条主义，长期搞理论脱离实际。”他并表示，“人的思想进步无止境”，要学到老，改造到老。

加入党，给唯实同志带来研究哲学的新的动力。此后，他就更加自觉地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付出了毕生精力。延安整风运动后，能代表唯实同志新的研究成果的除《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一书外，就要算是他对毛泽东同志的哲学专著《实践论》的研究了。他认为，《实践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并以此为题写成专著，于1951年11月由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专著连同他以后几年讲的课和写的文章，突出的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著名原理。他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实践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的讲演中，第一个题目就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他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取得的颇有意义的成果。本来，他还要出版一本论述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另一哲学专著《矛盾论》的书，而且已为此三易其稿，遗憾的是由于学校领导工作繁忙，终于未能脱稿出版。

唯实同志写哲学著作，一生主要着力于哲学的通俗化。毛泽东同志在《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一书中所提出的写哲学书要“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这一见解，更加促使他热衷于哲学通俗化的工作。他写书时，每写一段都要再三斟酌，反复修改，生怕读者看不懂。一有机会，他就把书稿念给周围的人们听，征求

意见。他对写哲学书或文章有一股罕见的热情和用不完的精力，又在写作和教学实践中锻炼出了一种把哲学理论大众化通俗化的本领。他写的文章（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及其以后的时期）就象讲话一样，绝不咬文嚼字，生硬堆砌或故弄玄虚，而是文笔朴实，通俗流畅，读起来亲切感人。在党的历史上，从毛泽东同志起，大力提倡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哲学通俗化的知名人士已颇不乏人，唯实同志可算得上其中坚持到底并做出了成绩的一位。唯实同志一生中，除了10余本哲学专著之外，还写了许多理论文章，特别是他讲过数以百次计的哲学课和其它课，每一次讲课稿就是一篇文章。到他去世前，他的书稿、文稿、讲稿，已累计200余万字。真算得上是一位高产理论家了。这也说明，唯实同志已经由一个自学成名的青年哲学家，成长为党领导下的革命哲学家，他的一生，不愧是革命哲学家的一生。

艰 苦 兴 学

唯实同志在整风过程中，深感自己实践经验十分缺乏，一再要求组织上让他到基层去做些实际工作。1944年组织上已初步同意他去豫西根据地，后因毛主席仍要他留在延安搞研究工作，未能成行。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东北急需大批干部，组织上便又决定他随去东北的干部大队到东北分配工作。队伍路过刚刚解放的张家口时，受命在晋冀鲁豫边区筹办北方大学的范文澜同志，来电坚请组织上派唯实同志参加北方大学工作，唯实同志便由张家口改赴山西。先是到黎城县与范文澜同志一起组建北方大学，并担任教务处长，后又担任设在长治县的北方大学工学院院长。当时已解放的长治县，有煤矿，有铁矿，在这里办工学

院，学生们一面学习科学知识，一面学习生产知识。这批学生后来多数到井陉、开滦等煤矿工作，成为这些企业的骨干，这是唯实在根据地办革命大学的开始。1948年夏，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出人意料地快，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成立了统一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由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与成仿吾任校长的华北联合大学也合并为华北大学，由吴玉章同志任校长，范、成二位任副校长。唯实同志先是担任第二部副主任（主任何干之），不久改任第一部副主任（主任由教务长钱俊瑞兼任）。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第十五两兵团进军两广，叶剑英同志受命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由北京出发时，毛泽东主席指示要在南方办好一所革命大学，大量招收两广地区的知识分子，培养新中国华南地区各方面建设的人才。叶剑英同志建议调唯实同志去筹办和主持这所学校的工作，并遵照毛主席指示定名为南方大学，由叶剑英同志兼任校长。10月14日，解放军解放广州，筹办南方大学的南下干部与广东部分干部汇合，在副校长陈唯实、罗明领导下，立即开始了第一期招生工作。到1952年底，南方大学共办了四期，毕业学生总计19300余人。这批毕业生后来大部分成为两广地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对建设祖国的华南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1年到1952年间，唯实同志率南方大学大批师生参加广东省山区土地改革，唯实同志参加了郁南县和怀集县的土地工作。1952年10月，由于南方大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在叶剑英同志推荐下，唯实同志出任刚刚成立的华南师范学院院长，直到1957年底调省委宣传部工作为止。

唯实同志在办学过程中，发扬了老解放区办革命大学的光荣传统，艰苦创业，获得显著成绩。这方面的业绩在他创办南方大学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南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极端匱

乏，单就校舍来说，只是一座以广州市立第三中学名义盖的八座小楼和十八座平房，据说是准备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时作“总统府”用的。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使国民党政府在广州没站住脚就逃离大陆，筹办南大的同志随大军进广州后，原来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处房子，还是唯实同志带领大家到处寻找校址时偶然发现的。发现后立即报请上级批准就地建校，第一期就招收了4000名学员，宿舍当然十分困难，唯实同志以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精神为榜样，号召教职学员亲自动手，克服困难，并亲自领导全体师生通过劳动建校，搭起一座座茅棚，盖起一幢幢平房，修建校内马路、体育场、花坛等等，还特地盖了一座以竹竿为架、葵叶为顶的可容5000人上课、开会的大礼堂，几千学生就在这里听课或集会。这座茅棚大礼堂和一座座茅棚课室成了联大师生勤俭办学的象征和历史的见证，华南师范学院迁入后，保留并继续使用了10多年才拆除，南方大学和华南师范学院两校师生都曾以此引为光荣和自豪。国内外人士来校参观时也对此感到不胜惊异和感佩，纷纷拍照留念。唯实同志还将师生劳动建设的实况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作为新生入校后学习的活教材。唯实同志还率领南大师生垦荒种菜，植树栽花，使校园一片碧绿，蔬菜成畦，果树成行，生气勃勃，风景宜人，既美化了环境，又改善了生活，很好地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

在华南师院，唯实同志从党和国家对师范院校的要求出发，十分重视教育学、心理学与中学教材教法课程的开设与讲课质量，强调学生要定期到中学去见习实习。他关心各门学科的教学，认真指导各科教学计划的制订和教材的编写，经常深入课堂听课，课后又同教师一起总结教学经验；及时表扬作出成绩和贡献的教师。他又十分重视科学研究的开展，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